

第 一 章

近代中国国情与旧民主主义革命

一 鸦片战争前夜的中国和世界

（一）文明古国的落伍和闭关锁国政策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远自 170 万年前，云南元谋人就在我国富饶美丽的大地上繁衍生息。迄今，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长达 4000 多年。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制度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其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曾长期居于世界各国前列。

在中国，农业、手工业生产源远流长。6000 多年前，中国人民就开始了水稻等农作物的培植。瓷器等手工业品的发明和生产始于公元前的商代，较欧洲真正掌握这些技术领先近 3000 年。《齐民要术》、《天工开物》等著述，是中华民族长期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科学见证。衡量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主要标志的生铁冶炼技术，早于欧洲 2000 多年。中国北宋时期就开始使用石油，而美国在 1859 年才建成第一口油井。在天文数学领域，中国也长期名列前茅。马克思曾称之为“最妙的发明之一”的十进位记数法，比欧洲早 2000 多年。魏晋时期刘徽创造的“割圆术”及南北朝时祖冲之对圆周率计算的精确程度都极其惊人。工

程建筑方面，战国时期的都江堰堪称古代世界水利建设之最。万里长城的修建、京杭大运河的开凿，都无愧为世界古代工程建筑史上的伟大奇迹。医学方面，中国的针灸疗法，早在秦汉时期就流传到海外，造福于世界。特别是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中国 2000 多年丰富的药物学和医学知识的科学总结，对人类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发明创造的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先后经中亚传入欧洲各国。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是（西方）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的先决条件”。直到明代中叶，在世界重大科技成就中，中国发明或发现的仍占到 58% 以上。当代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评论说：“中国的这些发明或发现，往往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辉煌成就的广泛传播，对世界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使中国较世界文明的古希腊、罗马早 1000 多年就结束了“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当西欧还处于奴隶制“文明时代”的时候，中国又率先 600 年跨入了先进文明的封建社会，使我们伟大祖国成为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巨人。

历史辩证法告诉人们，任何民族，任何国家，不可能永远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当欧美各国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时，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却正在兴起，这就决定文明古国必然日渐落伍的命运。公元 1644 年，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大清帝国。在它统治的 260 多年间，前期的几代皇帝开疆拓土，励精图治，曾有过“康乾盛世”的局面。然而，这种局面从乾隆末年起就迅速由盛转衰，呈江河日下之势。

经济上，封建社会制度已严重地阻碍着新的生产方式的发

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早在明代中叶就产生了，但发展得非常缓慢，到鸦片战争前，封建自然经济仍像汪洋大海一样居于社会经济的统治地位。封建剥削制度不仅更加促使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给大工业生产品，以顽强的抵抗”，而且使广大农民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这就严重地破坏和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此外，清政府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长期推行“以农事为首务”的“强本抑末”政策和“闭关自守”政策，就使幼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很难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而得到正常发展。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衰老时期的最大特点。

政治上，社会政治黑暗，吏治败坏。封建皇帝“乾纲独揽”，是贵族和大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清政府极端专制制度，像一座沉重的大山，死死压在亿万人民头上，使庶民百姓“冤苦莫诉”，而统治阶级却作威作福，享受各种特权。乾隆末年当了 20 年宰相的权臣和珅，以种种手段共积敛私财达白银 8 亿两之多，相当于当时清政府 10 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多是“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贪不贪，一任官，雪花银子三万三”，就是当时官场生活的真实写照。整个封建统治机器，都已腐朽霉烂。

文化上，清政府为了强化封建专制，又实行封建文化专制，对广大知识分子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政策。一方面实行科举制度，用“四书”“五经”将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另一方面，以“君心之好恶为好恶”，对稍有排满思想或被视为宣传“异端邪说”的知识分子，则加以残酷镇压。往往一人获罪，祸及九族。此外，清政府还多次下令查抄、销毁违禁图书等，使整个中国社会思想僵化，风气窒息，全然失去了生机。

军事上，武备废弛，国防空虚。八旗和绿营是清王朝维护封

建统治的主要兵力。但由于封建制度腐败，不仅使惯于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很快堕落，作为军事组织的八旗也日益解体。沿袭明制建立起来的绿营，其战斗力也是每况愈下。到鸦片战争前夕，驻防各地的约 80 万清军，军官大多只知克粮冒饷，不理营务；士兵“老弱滥充”，“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操防训练，有名无实，“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这样的军队，扰民劫财有余，用之守卫疆土就十分可悲了。

总之，当时封建专制下的中国，已百弊丛生，危机四伏，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1796 年前后爆发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起义和川、陕、鄂三省白莲教起义，表明清朝的统治已到了“日之将夕”的衰世。由于清王朝的衰败发生在欧美资本主义日益崛起的近代，这就预示着整个中华民族在世界风云激荡之中将要遭受空前严重的磨难。

闭关锁国，是清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推行的对外政策。清初，基于郑成功在东南沿海领导武装抗清斗争，顺治十三年（1656）清政府就实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康熙二十四年（1685）变“严禁”为“弛禁”，开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连云港附近）4 关，作为通商口岸。后由于西方殖民者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进行海盗活动，于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又实行了严格的闭关政策，封闭江、浙、闽 3 关，只留粤海关广州一口对外通商。同时采取一系列限制中外贸易的措施：提高关税，抑制入口、出口；外商买卖必须通过官方特许的十三行进行；外商在广州不准离开“夷馆”；外出不准坐轿，不准带妇女，不准在广州过冬等。清政府长期推行闭关锁国政策，是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原因的。第一，从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看，封建的剥削制度，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而顽固的封建

自然经济又为闭关锁国政策的实行，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使封建统治者可以在自给自足的帝国内昏睡。1793年，乾隆在复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就說：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可见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使统治者可以毫无顾忌地得以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第二，从政治方面看，由于国内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清朝统治者害怕广大人民和海外频繁交往，形成强大的反清力量。为了稳固清王朝的统治，乾隆之后随着清廷防范措施一个个出台，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也就愈来愈严厉了。第三，实施闭关锁国改革也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中国是一个历经数千年的文明古国，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等诸种因素就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文化思想传统

它一方面表现能够不断学习和消化外来思想文化，但另一方面，要使其在较短时间里向近代文明转轨，就显示出巨大惰性。当中国封建社会经过康乾盛世步入尽头之时，试图通过实行严格闭关政策，以阻挡滔滔而来的世界文明潮流，正是这种巨大的惰性的表现。

中国是一个主权大国，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对外政策。从“闭关锁国”政策实施的客观效果看，一方面，它具有维护国家主权的性质，作为一种防御手段，对抵挡向东而来的西方侵略势力不无作用。但另一方面，闭关政策对西方侵略势力的阻挡却是消极的、暂时的其结果只能使自己闭目塞听，观念陈旧，妄自尊大，背离潮流清政府开初往往把外国千方百计要求来华贸易看作是向中国“臣服”、“叩祝万寿，备进方物”的“朝贡”，对策是“加惠远人，抚育四夷”。这种迂腐思想观念，使中国完全不能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政治经济斗争形势。实践证明，消极的闭关锁国政策，不仅不能增强中国抵御外侮的实力，反而使

中国的防卫和应变能力变得越来越弱。在世界风云激荡的近代化潮流面前，中国若改革开放，其前途光明；若固步自封，必被动落伍，灾难深重。

（二）西方列强的崛起及其殖民主义

从 16 世纪初期开始，资本主义在西欧各国先后兴起。为了扩大资本的原始积累，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外进行野蛮的海盗式贸易和武装掠夺。自明代中叶起，最早将魔爪伸向中国的是葡萄牙人，其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也接踵而来。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崛起的资本主义强国。17 世纪初，英国还是一个农业国，经过 17 世纪中叶的资产阶级革命和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的产业革命，它的工业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起来。为了争夺海上霸权，英国资产阶级依仗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先后打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其殖民势力迅速扩张到了亚、非、美、澳的广大地区，成为称霸世界的头号强国。

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1789 年资产阶级革命后，经济力量迅速发展，到鸦片战争前夕，法国工业产量居世界第二位。法国在侵华过程中，长期以宗教文化侵略为其特点。美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自 19 世纪上半期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沙俄侵略者 1643 年越过外兴安岭，揭开掠夺中国的序幕。从整个工业发展水平看，美国和沙俄都远远落后于英、法，所以，在早期的侵华战争中，较多地扮演了帮凶的角色。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到 19 世纪 20 年代，世界广大落后地区已大多沦为欧美资本主义的殖民地。这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古老中国，就成为

西方列强争夺的主要对象。为了打开中国的市场，英国政府曾先后于 1793 年、1816 年派遣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来华，要求中国加开口岸、割让海岛、减轻税率等。1802 年到 1821 年，又多次在中国沿海发动武装挑衅，以求一逞。19 世纪 30 年代，英国工业品生产和交通运输业得到迅速的发展，出口总值由 20 年代初期的每年 3000 余万镑，增加到 30 年代后期的 5000 余万镑，其中棉纺织品占出口总额的 $\frac{2}{5}$ 以上。英国资产阶级将榨取巨额利润的希望完全放在开辟中国市场上。但在正当贸易中，英国商品在中国很难打开销路。不仅如此，中国的茶、生丝、陶瓷、土布与中药等日益成为西方各国不可缺少的生活品和工业原料，其中茶叶的进口还是英国政府主要税收之一。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出超地位，每年净出超总额达二三百万两以上。对于以赚钱作为“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标的”英国资产阶级来说，巨额的贸易逆差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采取卑劣手段，“靠‘毁灭人种’的办法”，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其追逐利润的无限欲壑，并伺机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以打开中国的大门。

二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一）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入侵与恶果

鸦片，俗称大烟，是一种具有强烈麻醉作用的毒品。最早将鸦片输入中国的是葡萄牙人。1727 年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并于 1773 年确定了对华的“鸦片”政策，这样，输入中国的鸦片就与日俱增。到 1821 年，鸦片已占英国输华商品总值的 50% 以上。鸦片的大量输入，使中英贸易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由出超转为入超。据统计，鸦片战争前 40 年，输入中国的鸦片 42 万多箱，中国损失银元 3 亿至 4 亿元。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它严重地毒害和摧残了中国人的精神和体质，给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灾难。到 1835 年，所谓的“瘾君子”已多达 200 余万。此外，鸦片流毒还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白银大量外流，不仅造成资金短缺，“银贵钱贱”百业萧条，国库空虚，使本已停滞的封建经济更加衰败。而且大大地加重了广大人民的捐税负担，使人民生活更加恶化。总之，罪恶的鸦片贸易，严重地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国人民强烈要求清政府开展禁烟斗争。鸦片战争前夕，清廷以鸿胪寺卿黄爵滋和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官员，坚决主张禁烟。

林则徐（1785--1850 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人。他为政清廉，深恶鸦片。在任湖广总督期间，即严厉禁烟，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他多次上书痛陈烟毒泛滥的危害：“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林则徐铿锵陈词，使道光皇帝深感烟毒泛滥严重危害，遂于 1838 年 12 月 31 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

1839 年 3 月 10 日，林则徐抵达广州。在广州人民的支持和两广总督邓廷桢、水师提督关天培的协助下，严惩贪官，捉拿烟贩，查封烟馆，收缴烟枪，限令外国烟贩于 3 日之内，将全部鸦片尽数缴官，并出具甘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禁烟斗争有力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迫使英美等国烟贩缴出鸦片 2 万多箱。1839 年 6 月 3 日至 25 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将缴获的鸦片全部当众销毁，虎门销烟，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伟大

壮举。它向全世界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和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坚强决心。林则徐为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独立主权，立下了不朽功勋。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第一幅巨型浮雕，就是当时虎门销烟壮观场面的真实写照。

虎门销烟，粉碎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鸦片打开中国大门，以牟取暴利的企图，英国政府遂以中国禁烟为借口，于 1840 年 6 月 21 日派遣海军少将乔治·懿律率领一支载有 540 门大炮的 48 艘舰船、4000 多名士兵组成的所谓东方远征军，发动了预谋已久的“旨在维护鸦片贸易”的侵华战争。

鸦片战争至 1842 年 8 月结束，共历时两年零两个月。其间，英国侵略者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他们所到之处，“无市不空，无家不破”，到处呈现一片凄凉景象。恩格斯深刻地指出：“英军作战时自始至终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完全相符的。”英国侵略，遇到了中国人民和清军爱国官兵的英勇抵抗。1841 年 2 月，老将关天培率部镇守虎门炮台，最后壮烈牺牲。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部 5000 余人，在定海保卫战中，与敌激战 6 昼夜，最后全军将士以身殉国。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英勇杀敌，战死吴淞炮台。他们功在民族，光照千秋！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落后，最终导致了中国的失败。

1842 年 8 月 29 日，在英国侵略者炮口的威逼下，清政府派代表同英国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1843 年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主要内容有：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割让香港；赔款 2100 万银元；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战后，美国、法国步英

国后尘，迫使清政府于 1844 年 7 月、10 月先后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从中获得许多特权，使中国的“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自 1845 年起，比利时、瑞典等西方小国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1846 年英国又以狡诈手段，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所谓“租界”。从此，中国的大好河山成了西方强盗为所欲为的“乐园”。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中国社会性质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战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战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领土被割裂，主权完整遭破坏，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实际上已逐步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战前，中国经济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国家；战后，由于外国商品的涌入，中国封建的自然经济日益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开始步入了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鸦片战争后，英、法侵略者为攫取更多殖民权益，在美、俄的支持下，从 1854 年开始，以“修约”为名，企图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当遭到清政府拒绝后，英、法两国便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从 1856 年 10 月至 1860 年 10 月，持续 4 年之久，使中华民族再次蒙受严重灾难。清王朝修建 150 多年，融汇中外建筑艺术精华，堪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被毁于战火。战争以中国失败告终。1858 年 6 月和 1860 年 10 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两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主要内容有：英法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和天津为通商口岸；对英法各赔款白银 800 万两；海关税务遵

请外国人“帮办”；鸦片贸易合法化；割让九龙司给英国等。

沙皇俄国在这次战争中是最大获利者。它通过政治讹诈和军事威胁，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璦琿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战后不久又签订了《勘分西北界约记》，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沙俄不仅取得了许多特权，而且侵占了 144 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美国诱迫清政府于 1858 年 6 月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从中也捞到了很大的好处。

第二次鸦片战争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大大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外国侵略者割让中国领土从一个香港扩大到九龙半岛，中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被沙俄侵占。开放口岸由 5 处增加到 16 处，且深入到中国内地、南北沿海。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外贸主权、司法主权等进一步丧失。各国使节常驻北京和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更是极大地便利了资本主义列强对清政府的控制。1861 年 11 月 2 日，慈禧太后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发动“辛酉政变”，掌握了清政府最高统治权力。此后，在“维持友好关系”的幌子下，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这就更加重了中华民族的危机和灾难。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亚洲许多弱国相继沦为西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唯独日本经过 1868 年的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日益崛起。1869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向外扩张的“大陆政策”。于 1894 年悍然发动了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从 1894 年 9 月至 1895 年 4 月，历时 8 个月，以清政府失败而告终。战争中，日军充分暴露了军国主义的凶残本性。在攻陷旅顺后，他们疯狂屠杀中国居民，全城幸免于难者仅 36 人，其凶残程度使西方随军记者也目不忍睹。在抗击日军的

激战中，北洋水师“致远”号管带邓世昌和提督丁汝昌等众多爱国将士，壮烈殉国，表现了他们崇高的民族气节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在日本的胁迫下，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主要内容有：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澎湖列岛）；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任意设厂。战后不久，由于俄、德、法三国干涉，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代价“赎回”辽东半岛。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后又一个影响至深的丧权辱国条约，它使中华民族危机达到空前严重程度首先中国的领土主权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台湾等大片领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西方列强趁火打劫，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俄、德、法三国分别租借旅顺大连湾、胶州湾、广州湾；英国在确保长江流域势力范围后又强租深圳湾、大鹏湾、威海湾；美国则别有用心地提出了“利益均沾，机会相等”的“门户开放”政策。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争相划分势力范围，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二，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马关条约》有关规定，使对中国输出资本合法化。他们加紧在中国开矿设厂，修筑铁路，这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独立主权，而且严重地排挤了中国的民族工业，直接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此外清政府为了支付巨额赔款。向外大举政治贷款，使得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中日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爱国志士谭嗣同曾悲切地写道：“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深重的民族灾难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5 年，引发了以京津为中心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以确保帝国主义在华权益，1900 年 6 月，以英、德为首的八国联军又发动了疯狂的侵华战争。侵略者在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残绝人寰。天津“死尸山积，海河竟为漂尸所阻塞”。“京内尸积遍地，腐肉白骨纵横”。“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凡义和团活动过的府邸、寺庙、民宅也统统被“举火焚之”。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腐败的清政府为了保住其统治地位，采取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反动卖国政策，于 1901 年 9 月 7 日与英、法、俄、美、德、意、日、奥、西、比、荷等 11 国签订了近代史上危害最严重的《辛丑条约》和 19 个附件。主要内容有：赔款白银 4.5 亿两，分 39 年还清，加上地方赔款 2000 万两，本息总数超过 10 亿两；允许外国军队驻守在京津至山海关铁路沿线 12 处重要城镇；在北京划定外国使馆区，并准许外国驻兵；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组织，违者处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以办理对外事宜等等。

《辛丑条约》的签订，是清政府对中国主权的一次大拍卖，也是帝国主义列强豺狼本性的又一次大暴露。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灾难。巨额赔款是对中国人民空前的掠夺，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更加衰败，人民更加贫困。外国在京津一带驻军，占领战略要地，并在北京划定使馆区，这就使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列

强控制之下的“洋人的朝廷”。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格局完全形成。

（二）清王朝的自我抢救与农民阶级的救国斗争

资本帝国主义血与火的殖民入侵及其尔后与中国封建顽固势力的勾结，使中国社会日益陷入了灾难沉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苦难深渊。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首先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和农民阶级中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响。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及农民阶级，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兴亡，从各自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方案，以各种形式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斗争。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政治主张，面对九州“陆沉”和西方“蛮夷”的入侵，清政府中一部分具有爱国思想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梦幻中惊醒，开始要求刷新政治，改变闭关自守现状，以寻求自强制夷之策，林则徐、魏源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林则徐是鸦片战争时期反侵略斗争的伟大民族英雄，也是封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用以“制夷”、“防夷”的政治主张，而且也十分注意了解和搜集西方各国情况，亲自主持编译了《四洲志》等一批最早涉外书报。他突破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观念，主张发展和保护民族工商业，进行社会经济的改革此外，他还敏锐地觉察到沙俄对中国领土的野心，提醒人们要引起对“俄患”的警觉和注意。魏源（1794—1857）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倡言改革。鸦片战争中，他曾积极参加浙东抗英斗争。战后，他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了《海国图志》一书，这是当时我国最为详细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一部著作。书中进一步阐发林则徐的政治主

张，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出夷之长技主要是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他认为只有“尽收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方能抵御外侮。与此同时，他还主张应把强兵与富国统一起来，要允许沿海商民“自愿仿设厂局”，保护出洋贸易，允许私人投资设厂开矿，发展国内工商业。

鸦片战争后，在中国社会和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之时，林则徐魏源等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他们的主张和实践，适应了当时形势的需要，堪称是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探寻国家出路的一代先驱。尽管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对西方的了解和认识还只是表面的，但他们勇于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打破了中国长期固步自封的传统思想观念，对后来维新运动的兴起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清王朝的自我抢救运动。至 19 世纪 60 年代，清政府先后受到西方列强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以及方兴未艾的农民革命的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封建官僚为了挽救清王朝行将崩溃的命运，一改过去妄自尊大的守旧态度，在“自强”、“求富”口号下，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发动了一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学技术，以维护和加强封建主义统治为目的的自救运动，史称洋务运动。倡导和从事这项活动的封建官僚被称为洋务派。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

清政府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简单归结为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又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看到西方近代军事装备的威力，所以，洋务运动首先从兴办军事工业开始。

以 1861 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军械所为起点，到 90 年代，洋务派花费巨额资金，先后建立了大小 19 个军工企业，其中规模较

大的有：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马尾造船厂）和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等。这些军工企业，经营权完全为封建官僚所控制；资金来源于国库；产品不参加市场交换，而是直接调拨给封建军队；经营和管理也沿袭封建衙门的一套规章制度，所以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这是其基本性质。同时，它又一切依赖外国人，如机器、技术和生产管理，甚至整个企业也受外国人操纵，表现了很大的买办性。实际上，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无一不是外国军火厂的附庸。因为资本主义列强既要通过军火贸易牟取中国钱财，也不愿意看到一个贫穷落后大国的崛起。所以洋务派所办军工企业生产的武器装备，就连李鸿章自己也承认，对内镇压人民“尚属可用”，“以御外侮实未敢信”。由此可见，洋务派标榜的“自强”只是徒有其名而已。

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洋务派为解决举办军事工业经费的困难，同时又从外国人在华创办企业大赚其钱中受到启发，于是以“求富”为目的开始筹办近代民用企业。从 1872 年李鸿章创办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始，到 90 年代中期，这类企业共有 20 多个。其中著名的除轮船招商局外还有：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汉阳制铁局、大冶铁矿、胥各庄到唐山的第一条铁路、湖北织布局、兰州机器织呢局等。这些民用企业，采用官办、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等多种形式，同军事工业相比，具有很大不同。其资本以私人投资为主，工人自由招雇，产品进入市场交换，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因此，其性质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但是，由于这些企业为封建官僚所控制，管理方式极其腐败落后，很多方面依赖外国人，通过压制民族工业而获取暴利，因此又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和垄断性。它们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官僚资本主义企

业，代表着中国最反动的生产关系。创办这些企业的李鸿章、张之洞、盛怀宣等人，则是中国最早的官僚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目的在于实行垄断性经营，以保证他们自己获取高额利润。这就不仅不能扭转清政府日益衰败的财政经济，而且也严重地阻碍着正在兴起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洋务运动中耗资最大的是建立近代海军。自 1875 年始到 1884 年，洋务派先后建立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南洋海军、北洋海军和福建海军。然而经过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南洋海军损失惨重，而福建水师和北洋水师则先后全军覆没，同时也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

洋务运动为期 30 多年。在此期间，洋务派官僚们试图利用西方先进军事科学技术，为封建专制下衰败的旧中国寻找一条起死回生的道路，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们较之冥顽不灵的封建顽固派是要高明一些。他们引进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创办的近代工业、近代海军，无疑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作用。但洋务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因为绵延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早已走向了腐朽没落，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严重障碍，近代新的生产力绝不可能在封建主义躯壳中自然发展起来，更何况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中国的富强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洋务运动既不可能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也挽救不了清王朝垂死的命运，其破产也是必然的。

人民群众自发的反侵略斗争。鸦片战争期间英军的侵略暴行，引起了东南沿海广大人民的强烈义愤。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同侵略者进行英勇的斗争。福建厦门近郊的乡民，以抬枪为武器与英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歼敌多人。活动在浙江宁波、镇海、